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

——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

Linguistic Explor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and Lyrics*

黄国文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黄国文著. - 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81095-719-8

I. 翻… II. 黄… III. 古典诗歌—中国—英语—
翻译理论—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209 号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员: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作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序 一

翻译工作者讨论语言的文章多,语言学家讨论翻译工作的文章较少。先有原作然后有译作,译作不过是派生的产品。

评论一篇译作,人们往往爱发挥己见,并不以某一派的语言理论为准。黄国文教授遵循 M. A. K.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中国古诗词英译作了一番周密细致的分析,可谓独辟蹊径,值得重视。

黄教授对翻译工作有许多意见,我所同意的主要是这些:

- 1、分析中国诗词,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着眼;
- 2、译文形式与原文不对等,不能因此说译文不好;
- 3、一个译本可能长于此而短于彼,因此中国古诗词英译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 4、译名很难与原文等值。中国的“清明节”不该译为 All Souls' Day,因为后者有宗教色彩,前者没有。

黄教授这本书,非但对翻译工作者有用,对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也有用。Halliday 的语言学理论究竟能为中国古诗词英译者解决多少问题,我们跟着黄教授的指引就能摸出个大概来。

王宗炎

2004年1月11日

对比语篇学与汉语典籍英译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序二

黄国文教授 1988 年就编著了一本《语篇分析概要》，这本书大概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语篇分析的著作。我是从读他这本书知道他的。后来他去英国拿了应用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两个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写过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大都是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前两年读过他的《英语语言问题研究》（1999 年，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书，收获颇多。2002 年刚读过他的《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2001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不久，他的书稿《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就送到我的手上。由于我手中诸事丛集，一直拖到今天才看完。他在上一本书中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广告文体的语篇。在这个研究领域他是领先的，王宗炎先生曾谈到：“除黄先生外，国内现在尚无第二人。”他这本《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又是对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他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既探讨了汉语古诗词的英译问题，又作了汉英语篇的对比研究。他在本书《前言》中明确提出：“书中各章的分析主要围绕着两个目的：一是试图通过功能语言学分析来揭示一些翻译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希望本书的分析可以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些启示；二是通过对汉语古诗的英译本分析检验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和语篇分析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看完书稿，我清楚地感到他设定的研究目标已经达到。从理论上讲，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汉语古诗词英译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包括经验功能、逻辑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语篇结构、形式对等、静态与动态、引述、时态、人称与专有名词等方面的内容。从应用方面来说，这个框架既可作评价汉诗英译和语篇对比研究的参照标准，对这类研究也有方法论的价值。因此国文同志的这本新作无论对从事汉语古诗词英译实践与研



究的学者,还是对从事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的学者在理论与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虽然没做过这个领域的研究,但读了书稿,我清楚地感到他在书中对古诗词英译和语篇对比问题从12个方面进行的分析,是那么清新、切实、令人信服,充分体现了语言学方法的精确性特点。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用诗学方法研究古诗词英译时所不注意或想不到的问题,而且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比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岭”、“峰”和“山”是单数还是复数?英译文二者都有,孰优孰劣?这首诗从逻辑功能方面分析,它由两个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构成,前两句为并列关系(parataxis),后两句为主从关系(hypotaxis)。但英译文有的不是这样处理的,甚至正好相反,如何评价这种不同选择的优劣?比如李商隐的《无题》中“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两个诗句中的人称问题,国文同志比较了六种英译文,发现了让人颇难回答的问题:(1)谁愁?她、你、我。(2)谁云鬓改?她、你。(3)谁吟?你、我。(4)谁觉月光寒?她、你。还有一种译文是模仿原诗没用人称代词的。这些不同的选择有何异同与优劣?很值得我们研究。再比如时态问题,作者专章分类对不同英译文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总结出了四条很有参考价值的规则(现在时和过去时都可用的时候如何选择;诗中明示将来或过去含义的时候如何选择;叙述和引语中的时态如何选择;变换或交替使用时态的时候如何选择)。我想不需要我赘述,只要你认真读一遍这本书,一定会有和我同样的认识和感觉。

这本书第一章“绪论”的构思颇不一般,表现出国文同志在学术研究上的功夫、智慧和高明。我们都知道吕叔湘先生在选择语料方面是特等高手,读过他的书和文章的都会有这种认识。比如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吕先生选了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两个句子:“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拿它们与其英译文(What matter if we have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Let them blockade us! Let them blockade us for eight or ten years! By that time all of China's problems will have been solved.)比较,一下子就提出了8个方面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



归纳出对比语言学的著名论断：“拿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比较，就会发现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一彼多或者此多彼一，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见杨自俭、李瑞华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1—22页）国文同志的做法像吕先生的做法一样，只选了苏轼一首七绝《题西林壁》的四种英译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比较，一下子就提出了本书要研究的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既有“山中”（语篇内）的，也有“山外”（语篇外）的，涵盖的面很广。由此可见，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修养需要功夫，语料的收集与选择也同样需要功夫。面对国内学术界的现状，着实应该大力倡导学者必须认真培养和追求这两种功夫。

还有一个值得倡导的主张，那就是王宗炎先生在《语言对比小议》中说的：“我们要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条龙——一条兴云作雨，灌溉整个学术王国的龙。”（见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第19页）国文同志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中已开始了英汉语篇的对比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做得更多更深入了一些。学外语的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外语与母语的对比研究，是不是一定要研究母语，这是值得学外语的学人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顾我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百年来基本上走的是中外结合的道路，就是学习、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同时跟母语研究与母语教学的研究相结合。历史证明，只有中外结合，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特别是现在，只研究外语或只研究母语恐怕都很难做得更好。在我国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外语界和汉语界学人长期共同努力。沈家煊说：“汉语界和外语界两股力量的汇合，小有进步，成效不大。外语界的学人‘搜集采购’功不可没，但是有不少人言必称外国，对国外的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问到自己母语里的情形就一问三不知。近年来不少人在论文中也开始举一些汉语的例子，但是蜻蜓点水，不痛不痒，有的甚至削足适履，拿汉语的事实去迁就国外的理论。”（见 Roger T. Bel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外研社版第23页）汉语界学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外语好的研究母语有了较大的进步，非常可喜，他们在起着领路人的作用。外语不好或不懂外语



的只能看翻译过来的外国语言学著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有些学人,问到外国语言学中的问题也达到了一问三不知的程度。现在最需要的是汉外两界学人端正态度,以大局为重,认真补课,取长补短,通力合作,为我国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看到的把语篇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的是 Basil Hatim 的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Hatim 在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和 Beaugrande & Dressler 语篇语言学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两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语篇本身的三个方面:语篇类型(text type)、语篇结构(text structure)和语篇特征(texture);第二部分是从语域扩展出来的语境的三个领域:规约性交际(institutional-communicative transaction),主要是语域涉及的内容(语场、语式、基调等);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ion),主要涉及意图性(intentionality);符号互动(semiotic interaction),主要涉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者把语篇分成三个方面放在这个复杂的大语境中,通过对比与翻译去研究它们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了语篇生成的机制和交际过程中重要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与参照,证明了翻译为对比语篇学(contrastive textology)提供了一个很适用的研究框架。

要想把对比语篇学和翻译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这项研究的发展,就应该在 Hatim 和黄国文两人所建构的不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做更系统更全面的探讨。为此我这儿提出几个问题供我自己和大家进一步思考。

(1) 什么是语篇?我在《语篇与语境》一文中曾说:“语篇是由两个以上交际单位构成的一个较复杂的交际系统。”(见张德禄等《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第 VIII 页)这个定义揭示没揭示出语篇的本质属性呢?语篇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

(2) 语篇研究除 Hatim 提出的语篇类型、语篇结构和语篇特征三个方面以外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研究?Beaugrande & Dressler 在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中提出的语篇的 7 条标准(intentional-



ity, informativity, acceptability, intertextuality, situationality, cohesion, coherence)对 Hatim 的语篇分析框架有什么影响?

(3) Hatim 的三分法语境和王建华的三分法语境(言外、言伴和言内。见张德禄等《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第 XII 页)有什么异同?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语境有什么启发?

(4) 黄国文的语篇对比分析框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框架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研究与改进?这个分析框架和 Hatim 的分析框架有什么异同?

(5) 什么是对比语篇学?为什么说翻译为语篇对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

(6) 语篇和语境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关系的研究对翻译研究有什么价值?

说到汉语典籍英译问题,我了解很少,只读过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蒋坚松、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先生的文章或有关著作与译著。我的印象是绝大部分都是讲汉语古诗词英译的,讲诗以外典籍英译的很少。记得潘文国和他的研究生写过一篇《古籍英译当求明白、通畅、简洁》,提出了古籍英译的基本标准,并说这是信达雅的具体化做法。(见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第 393—410 页)2002 年 5 月在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我们讨论了汉语典籍英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年 8 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决定在学会原有三个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和“英汉语篇学”两个新的领域。此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经过协商,我们在第六次全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中列出了这两领域的 8 个议题。前者为:(1)汉语典籍英译中的翻译理论问题;(2)汉语典籍英译中的语言学问题;(3)中国古典诗中意象的英译问题;(4)外国人翻译汉语典籍的动机与策略。后者为:(1)英汉对比语篇学的理论与方法;(2)英汉语篇生成比较研究;(3)英汉语篇与语言教学和翻译;(4)认知与语篇研究。这些议题和今年 10 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议题都是我们要不断研究和讨论的



问题。希望苏州大会的交流能有新的进展,同时也为2004年学会第六次大会做好学术交流的准备。现在我想就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谈一点我的想法,仅供大家在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1) 关于汉语典籍的概念问题。首先我们应搞清楚什么是“典籍”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第280页)1999年版《辞海》有详细的解释:“国家重要文献。《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少沈静,好典籍。’”(上卷第831页)另外《左传·昭公十五年》中也有“司晋之典籍”的说法。看来“典籍”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所以它的英译有 ancient codes and records 和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两种。依据上述分析和我们要研究的这个领域,“典籍”似应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世纪中叶近现代汉语分界处)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为宜。除诗词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类文体的重要文献与书籍。这个定义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重要”这个标准如何把握?二是用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的典籍算不算?第一个问题可以一方面依惯例而定,尊重各学科专家(比如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医学的等)的意见,另一方面可依新的研究成果而定(比如有过的过去认为不重要,后来发现很重要)。第二个问题,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他们的重要文献和书籍也是中国的典籍,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准确起见,可用“汉语典籍”的说法,英译文用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records 表示。少数民族的典籍比如藏族的可用“藏语典籍”表达,英译文用 ancient Tibetan books and records 表示。不知这样界定恰当不恰当?这儿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清代末年以后的重要文献和书籍算不算典籍?如果按定义外延的规定不应该算。二是现代人用古汉语写的重要文献和书籍算不算典籍?同上理也不应该算。不算可以,但问题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把上述定义修改为“中国古今重要的文献和书籍”,并可按时间划分为“古代典籍”、“近代典籍”、“现代典籍”和“当代典籍”。不知这两种界



定哪个更好些,特提出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2) 关于汉语典籍英译的标准和过程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汉语典籍英译作品中,其汉语大都是古代汉语,也有近代汉语(近代汉语一般说从晚唐五代前后到清代末年),而英语都是现代英语。这种翻译和把现代汉语译成现代英语的翻译有很大不同。后者的转换从现代到现代,而前者的转换是从古代或近代汉语先到现代汉语再到现代英语,虽然没出现现代汉语的文本,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脑子里是出现过一个内在的现代汉语文本的。这就给翻译研究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现有的翻译标准是否还合适的问题,从内容到形式译文和原文都有了较大的距离,“忠实”、“通畅”和“得体”都会更难把握。这种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解释性翻译。二是翻译过程增加了一个语内翻译阶段,原文为古代或近代汉语,译文为现代英语,中间为现代汉语,因而无论理解还是表达都变得更加复杂。我想上述问题是这个研究领域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3) 关于汉语典籍英译中的语言学问题。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做出的贡献,特别是语篇语言学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这种贡献是否定不了的。我们从 Nida, Catford, Newmark, Wilss 等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们重视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规律与客观世界规律的一致性,努力寻求语义的对等和语言转换的规律,以求通过研究人类翻译活动的科学性来建立翻译科学。这种语言学翻译观对非文学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实践与研究做出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出了它的明显缺陷。由于它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人类翻译活动的艺术性重视不够,对语言外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译者的目的等重要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不够,于是在翻译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倾向,因此受到大文化派(我称 cultural turn 之后的各派为大文化派)的批评。不过其中有的流派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它们赋予译者过大的权力,把翻译几乎等同于创作,显然这种派别没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现在看来,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特别是诗词翻译的研究除用语言学方



法之外,尚须用诗学的方法,只用一种方法都会有片面性,都会影响对原作的理解、鉴赏和评价,当然也就会影响译文的选择与表达。我们应该看到这两种方法都有优缺点,只有二者相互补充,才能较好地指导翻译实践,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大文化派倡导的研究方法可叫文化学的方法,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的功能、语言外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等。我们研究这些流派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要看到它们适应社会需要的一面,但也要看到把翻译趋同于创作的一面。林纾的翻译和《鲁拜集》(*Rubaiyat*)等一类的翻译大文化派认为是翻译,我们现在也可以接受,但我们决不应倡导所有的译者都做这样的翻译。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物极必反,这是真理。历史证明这个真理在人为学等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 Beaugrande, R. D. & Dressler, W.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Hatim, B. 1997.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 黄国文, 2001,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杨自俭, 2003, 语篇和语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 卓振英, 2003, 《汉诗英译论要》。北京: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杨自俭

2003年10月13日

记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前言

0.0 引言：关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本书是英汉语语篇对比分析方面的习作。我国学者对英汉语对比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形成大规模的研究队伍是在成立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1994)之后(见刘重德 1994,杨自俭 2000,2002,杨自俭、李瑞华 1990,李瑞华 1996,罗选民 2000)。英汉语比较涉及的面很广,有语言本身(如,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的比较,有文化方面的比较,还有涉及到翻译的比较,当然还有语篇的比较。近年来有关英汉语语篇对比分析的论文和著作越来越引人注目,我们手头这方面的著作就有:彭宣维(2000),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胡曙中(1993),罗选民等(2001)。彭宣维(2000)和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的理论基础是 Halliday(如 Halliday 1985, 1994; Halliday & Hasan 1976)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和这两本书一样,本书的理论指导也是主要来自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理论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语篇分析中应用得非常广泛。据 Halliday(1994: XV)自己说,他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黄国文 2001)一书中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用于广告语篇分析。本书是从另一个方面进行尝试,分析古诗词(本书所说的古诗词包括唐宋诗、宋词、元曲)的英译本。

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也属于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翻译涉及面很广,除了本体理论外,它还从语言学、哲学、文学、文艺批评、人



类文化学、认知科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逻辑学等学科吸收营养和精华,为其所用。因此可以说,翻译学这块领地像是一个胸怀宽广的母亲,有海纳百川的气魄。翻译学是一门经验性的(Empirical)学科,有人把它当作科学,也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门艺术。无数优秀的翻译家长期积累的丰富翻译经验和翻译方法,为理论探索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多少年来,翻译研究者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翻译理论,目的之一是想摆脱传统的评点式、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早在1965年,Catford(1965)就试图用Halliday的语法思想来建立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他所说的“语境”(Context)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是源于Halliday及其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J. R. Firth的理论,这两个概念对后来的翻译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近10多年来英国出版的关于语篇与翻译的论著(如Hatim & Mason 1990/2001, Bell 1991/2001, Baker 1992/2000, Hatim & Mason 1997, Hatim 1997/2001, Munday 2001)可以看出,语篇分析理论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理论是来自Halliday(如Halliday 1985, 1994; Halliday & Hasan 1976)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些以语篇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的翻译论著中,到处都可看到Halliday(1985, 1994)关于“纯理功能”(Metafunction)的论述;像“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主位”(Theme)这类概念是每本论著都会花大量篇幅来讨论的。

比起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如英国、德国)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在采用语篇分析理论方面起步较晚,这与我国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是一样的,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最近几年,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学术刊物上有越来越多的论文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所涉及的问题是各方面的,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例操作;最近几年,除了论文外,还有一些涉及语篇与翻译研究的论著问世,例如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2001)和萧立明的《新译学论稿》(2001)。这些论著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基于语篇分析的翻译理论框架(这点与语篇分析本身缺乏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模式有关,见黄国文 1988: 7, Hatch